

早稻田大学 与中国

未来にかける橋

架起通向未来之桥

[日] 安藤彦太郎 著

李国胜 徐水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早稻田大学 与中国

未来にかける橋

架起通向未来之桥

〔日〕安藤彦太郎 著

李国胜 徐水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桥/[日]安藤彦太郎著；李国胜，徐水生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307-07957-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7 - 2010 - 054 号

Copyright © 安藤彦太郎

本书中文简体版经原日文出版者日本株式会社成文堂授权，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I. 早… II. ①安… ②李… ③徐… III. 早稻田大学—汉学—研究—概况 IV. ①G649.313.8 ②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634 号

责任编辑：黎晓方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75 字数：168 千字 插页：5

版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957-1/G · 1702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战后的进程	5
一、中国观的变化	5
二、友好学术交流的进程	8
三、走向 125 周年的早稻田大学	11
第二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研究	14
引言	14
一、关于中国研究	15
汉学・东方学・中国研究	15
中国研究的起步	19
中国研究与汉语	22
二、辛亥革命和早稻田学者们的态度	26
大隈重信的中国论	26
早稻田学者的观点	30

其后的变化	33
三、战争期间的中国研究	38
1930 年前后的形势及后来的状况	38
兴亚经济研究所的设立	42
战争期间的汉语教育	45
结语	52
第三章 早稻田大学的汉语教育	60
一、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特征	60
旧学制与汉语教育	61
“商务”与“军事”	62
民间教育的源流	64
二、作为先驱的早稻田大学	65
汉语专业的设置	65
大隈重信的中国观	67
人才的培养	68
三、汉语学科的教授群像	69
青柳笃恒	69
渡俊治	70
郭明昆	71
实藤惠秀	72
其他教授	73
四、汉语教育的进展和今后的问题	75

汉语学科的加强	75
从旧学制转向新学制	76
面向下一世纪	78
第四章 大隈重信和孙文的“书简”	82
一、关于孙文的“书简”	82
二、孙文“书简”的执笔时间	85
三、“二十一条”的问题	90
四、关于其后的状况	93
附：孙文“书简”原文	96
第五章 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	101
一、李大钊简介	101
二、有关过去李大钊的研究	104
三、进入早稻田大学	108
四、在信爱学舍的生活	110
五、基督教社会主义	113
六、早稻田学者们的转变	117
七、从早稻田大学退学	120
八、结语	122
第六章 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彭湃	128
一、引言	128

二、彭湃的生涯	129
三、赴日留学	133
四、进入早稻田	137
五、加入建设者同盟	143
六、结语	147
第七章 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廖承志	152
一、“一个时代的结束”	152
二、革命家的一生	154
三、留学早稻田的日子	158
四、豁达的性格	162
第八章 研究中国的方法	165
一、日本的中国观	165
日本的两种中国形象	165
日本对中国社会的特殊观	166
“封建”语义的差异	167
二、西欧启蒙时期的中国观	169
法国的百科全书（学）派	169
重农学派的中国观	170
三、从自发性资本积累论到停滞论	171
斯密的观点	171
矢内原的理论	172

穆勒以后的中国论	174
四、马克思及其之后	175
马克思的亚洲观	175
马克思以后的有关看法	177
五、有关地域研究	178
地域研究形成的必要条件	178
历史观点的必要性	179
国际视阈的必要性	181
“文化大革命”之事	182
结语	184
附记	185
第九章 回忆早稻田	187
一、大山郁夫先生和中国问题	187
二、战争中的早稻田	192
训练与报国队	192
当教师	193
学生出征	195
帝国在乡军人会	197
全年动员	198
空袭	200
三、各学科的教授群像	203
青柳笃恒教授	203

五来欣造教授	206
林癸未夫教授	209
大浜信泉教授	212
齐藤金作教授	215
实藤惠秀教授	218
稻垣达郎教授	221
高木纯一教授	225
吉村正教授	228
会津八一教授	231
跋	西原春夫（原早稻田大学校长） 235
译后记	241

序　　言

我自早稻田大学退休后，一直担任日中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日中学院上一级组织的日中友好会馆的理事以及该会馆附设的日中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始终置身于同中国交流的第一线。

日中学院虽是一所规模不大的专科学校，但它却保留着堪称日本战后汉语教育“原点”的传统。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先生自战前一直致力于简陋的汉语教育，终于在战后1951年创建了日中学院，使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们云集于此。这些人后来都是各大学的汉语教师，承担起新的汉语教育的任务。仓石先生谢世之后，由负有同样盛名的汉学家藤堂明保先生继承这一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是第三任学院院长。从此，日中学院还开设了日语专业，招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学院也就自然成为日、中两国年轻人友好交流的地方。

我并不是汉学专家，但我在战前学过汉语，主要在早稻田大学研究中国经济、历史和近代日中关系史。我的教学工作已达半个世纪，其间，除了在东京大学作为外聘教师讲学一年之外，一直在早稻田大学执教。

近来，日中关系出现了新的进展，因而将撰写的有关早稻田大学与中国的旧稿汇集起来，试图从“早稻田”^①这个点，来回顾日中关系。然而，其稿不足成书，需补充内容，所以补写了《序言》、《大隈重信与孙文的“书简”》、《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彭湃》、《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廖承志》、《会津八一教授》等五篇。关于旧稿各章，后面均附有出处。

政治学大家丸山真男先生曾说过：“史学家是向后看的预言者。”虽说本书是以早稻田大学为轴心的日中关系史，但我认为本书丝毫不符合丸山先生的名言。不过，当我们回顾日本近代史，审视与中国关系时，会发现有明显的两重性，这就要求我们有严肃的历史眼光。比如，从大隈内阁到原敬内阁时期，“民主主义”思潮甚浓，可日本是将中国作为正面之敌对待的；日本高喊“日中亲善”，宣扬关心中国，再没有比在“二战”期间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时更有甚之的。而且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常常缠绕着一种落后于欧美的日本独特的“亚洲主义”思想和情怀。要阐明历史就需要我们有清晰的历史眼光。

我们不能占卜未来，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一些“教训”。本书的论述虽不高明，但读者如能从中多少体察到作者的意图，我将荣幸之至。没想到本书在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之际问世。实现“邦交正常化”是 1972 年 9 月，整整经历了 30 年。我听说今年是日本的“中国年”，中国也称之为“日本年”，计划

^① 本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文中出现“早稻田”、“早大”均指早稻田大学。（译注）

举行各种纪念活动。4月份以后，中国的领导人相继正式访问日本，日本的很多代表团也将访问中国，各地区和各组织都在筹划开展各类纪念活动。

这些的确可庆可贺。战争已经结束了57年，其前半却是“邦交非正常化”。为何有27年时间没有恢复邦交呢？为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今日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的大转型期，了解中国，加强友好是有益于我们开创未来的。我在书中讲述历史是希冀能对日中友好交流有所帮助。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竹中宪一教授在资料上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而且我的妻子、法学部教授岸阳子作为中国研究者也提出了直率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为早稻田大学和中国的交流奠定了新基石的早稻田大学校长西原春夫先生为本书撰写了“跋”。

本书付梓之际，还承蒙成文堂编辑部的玉子三男和本乡三好先生的帮助。我在早稻田大学执教的最后一年里，玉子三男先生来到文学部听我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课，并录了音。其演讲内容原以《中国近代史入门》的形式成书，然未果。本书所选录的《中国研究方法》也是我在政治经济学部讲授的最后内容，玉子先生也给我留下了有声资料。本书在编辑中，有劳本乡先生的帮助，才使得出版工作进展顺利。

虽然出版业状况不佳，但成文堂出版社社长阿部耕一先生却承诺了本书的出版，在此特致谢忱。阿部社长很早就支持日中学术交流，尤其是法学方面的交流，是中国所说的“挖井人”。这里，特

别值得赞赏的是阿部社长所作出的鲜为人知的功绩。

安藤 彦太郎

2002年4月10日

第一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 ——战后的进程

一、中国观的变化

对日本来说，在诸多国家中，中国有着重要的存在意义。第一，地理上是近邻。从东京到北京，乘飞机只需三个多小时，北京和上海的街道情景和行人的表情与日本无甚大差异。而且，中国是不可忽略的大国，其国土辽阔，相当整个欧洲（扣除意大利半岛），大约 13 亿人口，世界人口中，五个人里有一个中国人。第二，文化上有密切联系。自古以来，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日本文字基本是从中国传来的，有着难以估计的深刻影响。近年，中国在产业、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中，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象。第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现在日、中两国处于密切的关系中。中国加入了 WTO，2008 年举行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成为日本的重要战略合作国家。

但是，日本曾侵略过这个国家。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

算起，15年间，侵略不断。从1939年7月7日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向中国全面进攻算起，中国称之为“八年抗战”。而近年日本逐渐形成一个说法，就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日中15年战争”。我比较赞成这个说法。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并在这里建立垄断的殖民地，接着发起卢沟桥事变，进一步引起国际性摩擦，直至酿成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因而，对于日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在与中国的战争，“日中15年战争”的说法是再明白不过了。

日本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进程中，日本对战争不作充分的批判，因为日本有亚洲主义和“兴亚”思想的问题。就此略谈自己的观点。

落后欧美各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日本，借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说，即采取“脱亚入欧”的路线。与其说“脱亚”，倒不如说形成了一种心理，而另一方面日本受到欧美先进国家的压力，希望亚洲各民族团结一致，抗衡这种压力，又酿成了“亲亚”、“兴亚”的心理。近代化的基本思想是建立在一边“脱亚”，一边提出对抗欧美的“兴亚”关系上。“脱亚”心理和“兴亚”心理看起来是两个极端、截然不同，可无论是时代潮流，还是个人精神方面，两者微妙地交织在一起，难以分隔。

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日本向中国侵犯并发展为战争，直到“二战”结束（1945年）。其间，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意识在民众中扩展。具有象征性的例子可以说是无视宣战手续。自甲午战争后，没有事实证明日本作为国家正式向中国宣过战。事实

上战事都发生在中国本土，无论是杀害许多中国人的“日俄战争”，还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日本都没有正式向中国发出过宣战书。这说明日本不承认中国为国家，将战争解释为“解放”，一直发展到所谓实现“解放东亚”的“大东亚战争”。于是，侮蔑和侵略被“兴亚”心理所笼罩，并合理化。

在这种状态下，虽然战争时期高喊与中国“亲善”，但自清末以来却不顾中国为近代文化建设而奋斗的现实，也不作方面的研究。例如，在优等教育中，外语只限于英语、法语、德语等欧洲各国的语言，在战争时期，中文在学校的教育中就没有被列出过，唯早稻田大学例外。在大隈重信的主导下，早稻田大学很早就设置了中文和中国研究的科目。有关其历史和实际情况，见本书各章所述。

然而，在日本整体的学术、教育的动态中，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趋势。我认为从中汲取宝贵的传统经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工作。战争结束时，过去“兴亚”的心理受挫，国民对中国的关心一下子低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以及亚洲发生新转机的重大事件，本应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变化，可当时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下，大陆的信息得不到传递。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变化是在至后的二三年，尤其在文化、学术交流方面显得姗姗来迟。早稻田大学为中日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开了先例，带来了变化。担任其主角的是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大浜信泉先生。1955年12月1日，以郭沫若先生为团长的15人访日学术代表团来到日本。这是由日本学术会议邀请，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日的正式学术代表

团。可是，当时文部省指示各国立大学不能给予接待。大浜校长却将代表团请到了早稻田大学。

二、友好学术交流的进程

郭沫若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团是由一流的学者组成。日本文部省不仅表示出轻视的态度，而且发表讲话，禁止正式访问以东京大学为首的国立大学，如果国立大学接待了，将处罚校长及校长以下的责任人。因此，代表团不能与国家机构做任何交流。为了接待代表团，民间组织了欢迎委员会，国立大学的教师们以个人身份参加。委员长由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野口弥吉先生担任，早稻田大学的实藤惠秀先生和我参加了。我与实藤惠秀先生商量之后，决定见大浜校长，报告代表团不能访问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情况。正如我在“追忆早稻田”中所写，大浜校长对中国很感兴趣，学生时期，我与先生就很亲近。大浜校长听了我的汇报，当即就做出了决定：“情况知道了。由早稻田来接待！”代表团访问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日，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访问了早稻田大学，与教授们交流之后，校长在大隈会馆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12月8日，郭先生在公共大教室作了课外演讲。

在大隈庭院边散步边交流，欢迎仪式盛大。可是，郭先生8日的课外演讲规模更是可观。教室里挤满了学生，有的学生坐到了讲坛上。为了照顾进不去的学生，在公共教室前的广场上安装了扩音